

Studies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区域文化与 文学研究集刊

周晓风 张中良 主编

第1辑

区域文化与 文学研究集刊

Studies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周晓风 张中良 主编

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周晓风主编·一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04-8961-0

I. ①区… II. ①周… III. ①区域—文化—关系—文学
研究—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12-53 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696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401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杨匡汉

近几年来，随着“文学地理”的理念和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人的认可，确实对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有拓展性意义。以往大家习惯于和满足于对文学的宏观描述，远远不足以多角度、多视点地呈现众多特定地域和区域的文学发展进程与标志性文学风貌，也远远不足以多层次、多知觉地重新解读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灵性世界、民族生活与个人记忆。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水土”并不具有“决定一切”的本质性，但如果从“大地理”到“小水土”都运用趋同的知觉方式和统一的叙事风格，从创作到理论都“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如此的文学研究生态，则是反常的、可悲的。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绝迹。这样，以“文学地理”、“区域文化”的思路，介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象与叙述的重新解码乃至编码，无疑可以打破一体化的格局，揭示出某种事物或某种主题在特定地域文化语境中的丰富语义。而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丰富性，既可呈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复杂性，也可展示不同地区文化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从而使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并非单一的轨迹，不同区域以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区域发展的多样性的有机关联。

人们或许会问，区域能给人带来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意义有过经典阐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一著名论断，强调了人是历史性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着的。也因此，分析人所栖居或流动的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区域特性的形成与脉络，探究作为“人学”的文学在不

前 言

同区域的表现形态，不仅可以认识文化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还有助于将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目光，从中心殿堂移向各路庙宇，从“正统”移向“异端”，从“地表”移向“潜在”，从而更开阔我们文化与文学的视野，更深刻地体悟“人文历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大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还会注意到，区域文化资源蓄寓了人文精神，然而大凡杰出的文学作品，既源于区域文化底蕴，却又常常逾出区域的地界分际，而表现了中国文学之精神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成为区域性与全国性相映成辉的文学。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言：“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面社会影响特甚焉。”任公列举的不过是表象，但精神的东西却难以区分南北东西。李清照词婉约与豪放兼有，“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满庭芳》），很难断定属齐鲁文化，其托物言志，表现了历经磨难仍高洁自好的普适品格；范仲淹被贬时“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吟咏，也超越了“边塞诗”而传达了历史性的文化记忆；从李白的《蜀道难》到巴金的《家》《春》《秋》，可以理解为与巴蜀文化紧密相关，却又不为区域所限而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命浩叹；即便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与京味风采，但也逾越“京派”的坐标与范式，艺术地呈现了底层弱势者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焦虑，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它是出色的“现代派作品”。

任何一个区域内，文化与文学也不会完全是均质的。造成“这里”与“那里”的差异，有地理、语言、宗教等诸多因素。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无论吴越荆楚、岭南湖广或是巴蜀齐鲁、空旷西域，天悬地隔，南枝北阮，常以“风俗”表现得多姿多彩。风俗包括民间信仰、神祇崇拜、风气习尚、居住方式、聚落类型、衣食特征、方言运用等内容，既有现实性的物质层面，也有历史性的非物质层面。“风俗”的差异往往直观地体现着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地域文学的特色。中国人历来视风俗之厚薄为兴亡的一个象征。当年苏东坡甚至将此与“道德”价值联系起来。他在一篇《上皇帝书》中写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

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观中国数千年大历史，稳定时期不过三五百年（近三十年堪称奇迹），大多处风雨时节，兵燹不断，谷籴常贱，年荒悲凉，东海扬尘，染黄染苍。然地域可道，地域所孕育之魂魄更足可道；区域可道，区域稔丰之文脉更足可道；东西南北亦可道，时移俗易所积淀的民德如美玉韫石更足可道。这正是中国至今尚于贫困中得以永续发展的精神原动力，也是文学必须关注的文化资源。

本册《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是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的集体成果。研讨会于2009年11月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紧凑、饱满、热烈的讨论与争鸣，对许多前沿性学术话题有了比首届研讨会更深入的展开。其间，所涉及的诸如“东亚人文地理”、“区域文化精神与心理结构”、“区域文化的特殊性与本土文化的普世性”、“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区域文化与文学流派”、“文学图志的审美书写”、“区域文化与现代性”、“用中国经验诠释区域文化”、“行政区划与地域人文”、“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等知识命题，都引起了与会者的学术兴趣，也有可能成为学术的生长点。研讨的结果说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将不是孤立静态的，而应以动态、开放、发展的思维去扎实地践行，并以和而不同、互动互渗、包容共生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追求。

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重庆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并已成为重庆市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相应地成立了区域文学委员会，以共襄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之盛举。此一学术举措，并非“制造热点”，而在于“发现问题”。自然，这辑“集刊”所集纳的还是初步的成果。可幸的是，主办方有决心“一年一刊”地坚持下去，让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得到全国各地学人更多的、文化含量更高的科研成果的支撑，为提升国家民族的精神品格提供有益的借鉴。

庚寅灯节于北京潘家园

目 录

前 言 杨匡汉 (1)

笔谈一束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杨义 (3)
时空意识与学术自信

——在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

研讨会上的讲话 杨匡汉 (10)
区域与区域文化 胡明 (12)
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凌宇 (16)
区域文学研究空间广阔 秦弓 (22)
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何锡章 (24)
区域化：一个有机的文学概念 王本朝 (26)
当代中国区域文学的体制化特点及研究困境 刘川鄂 (28)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限度 张全之 (32)
对于当代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疑虑 赵黎明 (35)
区域文学研究现状之反思 王学振 (38)

理论与实践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以重庆文学为例 周晓风 (47)
本土化视野中的文学史思考与书写 逢增玉 (60)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

——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 张泉 (68)

目 录

- 论当代新诗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微妙关系 王 珂 (76)
从区域文学与文化角度来看解放区文学的复杂性 袁盛勇 (87)

区域文化精神与现当代文学

- 京派作家的文化观念与文化资源 刘 勇 (91)
地域文化精神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
——论“浙江潮”对新文学现实主义
 思潮的引领意义 王嘉良 (109)
长安文化与当代秦地作家 赵学勇 (123)
通俗的变异：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 张 曜 (140)
黄土地文学图志的审美书写
 ——秦地文学的地缘风貌 冯肖华 (153)
逍遥于“出儒”与“入儒”之间
 ——孔孚山水诗与儒家文化 贾振勇 魏 建 (177)
台湾民间文学的地域文化个性 陶德宗 (185)
论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罗显勇 (191)

巴渝文学暨抗战文史

- 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 吕 进 (207)
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
 ——以巴金与巴蜀文化关系为例 李 怡 (219)
抗战文学研究中“重庆形象”扭曲化之纠正 新明全 (228)
抗战时期之区域文学论 朱丕智 (231)
现代中国“西方”的文化与文学
 ——以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为例证 郝明工 (238)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 20 世纪初期重庆文学 李文平 (250)
论民国时期重庆地方报刊在大众传播实践中的
 特殊意义 张育仁 (257)
吴越、秦晋、巴蜀：一个文学三角形构架的
 现象思考 邓经武 (269)

目 录

- 重构现代巴蜀文学史的思考 张建锋 (279)
内迁潮流与重庆抗战诗歌的发展 熊 辉 (289)
陪都语境下的重庆故事
——论张恨水的重庆题材小说 李永东 (296)

区域视野与文化现象

- 首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人文北京”建设 万安伦 (317)
民初北京旗人的社会流动与满汉文化交融 常书红 (333)
被“区域”捆绑的自娱自乐的艺术
——中国纪录片区域性现状初探 金 洁 (346)
中国新文学中节日体验的地域特征 陈祖君 (353)

信息传递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357)
- 后 记 (367)
- 稿 约 (369)

笔谈一束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杨义

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学界的朋友们欢聚一起切磋交流，感到机会难得，是重庆师范大学给我这个机会。我来之前，起码在北京、上海、杭州有五个会议，包括马上要在中南海启动的传统文化讲座。于此忙碌繁杂中来到重庆，山城的热情给我很多亲切感。我觉得，“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非常有意义的好地方。记得四年前，在这里召开抗战六十周年纪念会的时候，我在会上讲了关于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重庆师大聘请的冯宪光教授也讲了抗战文学与文学地理学的题目。所以文学地理学的思路与重庆渊源很深。我现在一直在做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么一个工程，之所以用“地图”这个概念来讲中国文学，就是要在文学完整性上展开它们的巨大空间，展开它们的地域文化脉络的丰富性，展开其中的民族、家族、作家个人及其群体的生存流动聚散等空间上的问题，探讨我们民族发展过程中完整、丰富、异彩纷呈的文化精神谱系。

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重庆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生命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跟巴蜀地区非常有关系，而且是一种关键性的关系。因为中华民族在秦汉开拓大一统的格局后，在两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生命过程中，往往谁得到巴蜀，谁就得到大一统，这一点为多次改朝换代、南北冲突融合所证明。为什么我们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断？过去很多学者专门从概念上讲儒释道的价值和功能，但实际上的问题恐怕不能这么简单，这么空泛。很重要的原因是除了黄河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长江文明，有这“两河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在中世纪的北方崛起了一个草原帝国，草原帝国的疆域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在冷兵器时代，草原骑兵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如“秋风扫落叶”，很多古老的农业民族都被它摧毁了。但是唯有中华民

族还奇迹般地坚守着，百折不挠地发展着，就是因为它由西到东由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哺育，具有丰富的生存屏障、众多的资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比较起来，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长条的河谷绿洲，所以阿拉伯人来了，马其顿人来了，它就缺乏回旋余地，容易中断。中东的古巴比伦也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样的两河流域，但我们的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比它们大了七倍，腹地很大，这给我们在民族博弈和发展中，提供了进退的余地和回旋应对的弹性。

由于地理气候形成的游牧、旱地农业、稻耕农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古代中国的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融合，主要表现为南北碰撞推移。北方少数民族进犯中原，在平常的时候长城是可以抵挡一下的，可以在那里驻兵设防，开关贸易。但是当北方少数民族真正强大到极点之后，长城挡不住了，什么东西挡住了它呢？长江。中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过南北朝，试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长江这道“天堑”，中华文明就可能中断了。正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时，汉族的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把长江流域搞得比黄河流域还发达。北方少数民族入中原，浸染中原的汉族文明，住在未央宫比住在帐篷里舒服吧，所以它就逐渐地被汉化或华夏化了。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越来越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在南北对峙之后，出现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偏于西部的巴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登基前半个世纪，秦人就占领了巴蜀。巴蜀的开发，使秦国的土地和国力增加了一倍。他们利用巴蜀这个财富源泉，支撑战争，收买列国重臣，势如破竹地兼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击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除了善于收罗、驾驭和使用杰出人才之外，依恃的也是关中的兵，巴蜀的饷。汉以后出现了三国，晋朝统一全国也是首先拿下了蜀国。原先曹操与孙权打仗，曹操进攻孙权，曹操必败，孙权进攻曹操，孙权必败，因为一者长于陆战，一者长于水战。但是一旦拿下蜀国和襄阳，就雄踞长江上中游，可以建楼船，练水师，一旦东吴有变，就顺流而下，统一全国。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是由于隋据有巴蜀。南朝梁发生侯景之乱，西魏乘机占领荆襄、巴蜀，北周取代西魏之后又灭北齐。此时的南朝陈只有三峡以东、大江以南的土地，因此隋文帝篡夺北周帝位，消灭陈叔宝也就水到渠成了。宋太祖陈桥兵变，向南方用兵，也是乘乱进入长江中

游，又消灭后蜀，才从长江的上中游进攻下游，消灭了南唐李后主的小朝廷的。长江下游江面开阔，靠近南方朝廷的心脏区域，必有重兵把守，必遇殊死搏斗，北方的骑兵、步兵贸然过江容易失去优势，面临严重的危险。金与南宋对峙，金兵在西线遇到吴玠、吴璘的有效抵抗，一直未能进入巴蜀，这对南宋能够保持偏安局面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样金兵只能直接跨长江，而直接跨长江就吃败仗。金主完颜亮屯兵四十万，在采石矶对岸的和州，要跨长江灭南宋。有个四川书生叫虞允文，是跟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同科的进士，他搜集零散的士兵和船只，只用 18000 人就把金兵打败了。骄横的金主完颜亮属游牧民族，不谙水战，撤兵途中就被部下暗杀了，这就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和我们重庆有重大关系的，是 13 世纪蒙古帝国灭金之后，40 年后才灭南宋。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除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西征，一直打到伏尔加河之外，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大军向西打破襄阳、成都，忽必烈从陇西穿越二千里山谷，乘羊皮囊下金沙江，袭破大理国。当时的蒙古骑兵被罗马教皇称为“上帝的鞭子”，但蒙哥汗亲率 10 万大军进攻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时候，被飞丸击中而死，使钓鱼城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上帝折鞭”的英雄城。蒙古军已占领襄阳、巴蜀、大理，实际上已从上中游渡过长江，因而回师东南，灭宋已成摧枯拉朽之势。这就是说，元朝统一中国，也是印证了先得巴蜀、后成统一的历史通则的。现代的巴蜀在支撑国家命脉和完成统一、独立的大业中也发挥了无以代替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南京、武汉相继沦陷，这里成了战时陪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司令部。而且我们的十大元帅中巴蜀出了四个——朱德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他们在全国解放统一中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我开头就讲，在巴蜀这个地方谈人文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是个非常合适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极佳的立足点和精神关注点，总览维系着全民族生命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冲突融合，总览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往往是“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的历史进程。关注巴蜀文化，实际上是关注中华民族发展合力的一个关节点。

最近我到日本名古屋、京都、神户等地讲学，讲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另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北亚人文地理》。我讲到，现代文学研究精神空间的扩展，是我们首先值得注意的重大的收获，精神空间扩展的基本标志体现在以“中国现代

文学”这六个字命名的这个学科返回到它的本体和本质，在本体和本质上生长出新的学理维度和思想深度。

首先，“文学”要回到“文学”。发生于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还是一段与现实存在深刻纠缠的历史，许多作家变成政要、社会名人、受改造者或流亡海外者，因而文学领域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把他们当成斗士或被斗士，甚至他们过去的作品往往被看作隐藏着政治态度的特殊档案，被简单地进行“香花和毒草”的评判。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使一大批作家的作品从政治或阶级斗争的附庸中分离出来，作为时代与人的审美文化的表达和想象来对待。加之以开放心胸接纳外来的批评流派的话语智慧，文学研究的空间变得非常开阔，维度、方法变得非常丰富多彩。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守正创新中首当其冲，涌现出一批根底扎实、气象清新的文学史和专题著作，资料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展。至今几乎一年的论著就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这都是把文学当作文学的创造空间大拓展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现代回到现代”。文学领域的“现代”的整体性，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化构成。但是过去现代文学研究中把这种“现代”删除得只剩新文学甚至革命文学一根杆儿。改革开放要恢复“现代”的本来面目，就发现现代文学除了有新文学、新小说之外，还有通俗小说。苏州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建树，追寻“新体”、“俗体”比翼齐飞。至于除了新诗之外还有传统诗词，二者都应进入文学史写作，就至今还存在分歧。民国年间的旧体诗如果进行全面清理，不在10万首以下。不仅老文人、教授、书画家、政治人物写旧体诗词，新文学家中的不少人虽在公共空间写新诗，却把私人空间留给旧体诗词。这都是有深刻文化意识的文学史家，应该认真反思的。新诗的发展就能截然砍断传统吗？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茅盾、郁达夫，都是提倡新文学的大人物，但他们都在写着旧体诗，蔡元培还主张新旧体诗并存。毛泽东到重庆我们这个山城来谈判的时候，如果不是拿着旧体诗词《沁园春·雪》来，而是拿着类似胡适发表的第一首新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这样的诗来，那就成了大笑话。《沁园春·雪》宣示了一种分量、一种修养、一种雄视千古的气象，是一般的新体诗代替不了的。当然旧体诗对于一些现代生活、事象、心理、感受，也有描述不了，或者抒写不精细的。所以新诗旧诗要并存，相互取长

补短，融合创新，共同开拓现代诗歌形式。就像我们的戏剧除了曹禺，还有梅兰芳一样，如果中国诗坛被胡适大呼一声，整个都变成新诗的一枝独秀的天下，这就不是中国了。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复杂、丰富、源远流长的文学经典体系，这就注定了它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展示着一种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精神文化图谱。

第三个问题，“中国回到中国”。中国文学要还原它的完整版图，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学都应有专门的研究、比较研究和相互关系研究。台港澳文学要研究，京派、海派文学要研究。抗战文学由于战争割裂了地域，出现了大后方文学，大后方也有文化重镇，比如重庆、昆明、桂林、香港，都出现了一些文学群体和文学生产传播体制的地域特点。还有解放区延安文学，以及战区、沦陷区文学，都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方式。如此多的领域，在改革开放 30 年间，都重新搜集材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编写的三卷本现代小说史与其他文学史的不同，除了文化研究和审美体验的视角转换之外，很重要的是在大量原始材料基础上展开丰富的空间维度，地理的维度。东北流亡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京派海派、华南作家群，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孤岛，还有香港和台湾，领域都是以往文学史未曾言或言之不甚详的，但本人的小说史是将它们纳入文学发展过程的完整的立体的结构之中，以扎实的材料论述了它们的发展脉络、地位和审美文化价值。许多作家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回归位置，展示风貌，这也是受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研究空间之赐。

空间问题、地域文化问题，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新关注点，实际上也是现代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的精神取向。记得前几年在苏州开一个国际汉学研讨会，美国的王德威先生问我现在作什么研究，我说：“我就是在大家习惯的文学研究的时间维度上增加并且强化空间维度。”他非常感慨，认为欧美所谓后现代就是用空间的多维性来瓦解唯一中心的封闭性。这使我联想到阿拉伯《天方夜谭》（今译为《一千零一夜》）中那个《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虽然文学不是“懂暗语的石门”，但空间意识的深刻介入，往往使我们如念了“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文学意义之门豁然洞开，使我们看见里面金光灿烂的秘密。讲中国文学不讲空间，不讲人文地理，不讲民族和家族问题，有时会像没有掌握“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石门当道，是说不清楚中国文学的内在奥秘的。自文学和地理打交道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原则，因为只有时间维度的

话，我们注意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就是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阶级与大众。这个维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另一个空间维度一旦介入，就会关注民族、家族、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展示、流动和相互关系，调动浩繁的文献、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材料，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脉络，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精神谱系。人文地理中地理这个维度，具有稳定性，比如重庆的夔门，一千年一万年也没有多大改变，但人文因素的加入，建设一个三峡水库就把夔门变成一片平湖。地理是长时段的，但是人文变迁的时间单位相对较短，其中历史遗存和积累时段会长一些，而社会的经济水平、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的变化，或快或慢，时段也许短些。“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国王和上流社会对时尚变化影响很大。因此，人文与地理的交错就出现了许多状态、许多原则，造成了稳定性和流动性并存的局面中种种文化和文学的运行曲线。重庆还是那个重庆，可是战时成了陪都，前些年又成了直辖市，它的人文和地理的结合就是产生了许多越出常规的变轨运动。深圳作为经济特区，采取改革开放优惠性的措施，就由默默无闻的小镇变成高速发展的大都市；一条陇海线和一条京广线的交叉，就使郑州变成了中部的交通中心，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会。空间的转移和人员的流动会造成文化态度的调适和变化。现代文学中的安徽作家台静农、李霁野等1948年去台湾，是去“文化光复”，而不是去宣扬文化上的反传统。因为那时日本对台湾已经实施了50年的殖民统治，很多作家都不会用中文写作了，当务之急是派教授去开展国文国史的教育，这是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的大义所在。这些新文学作家曾经追随鲁迅，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面对光复初期的台湾，必须调整文化态度，强调的是“文化光复”而不是反传统文化。可是我看一些研究现代文学的年轻人，在学位论文中还说他们到台湾是宣传五四，传播反传统，这就未免被“现代性”一类术语挡住眼睛，不辨空间转移的意义了。回到真实而充实的空间来，就会发现，台静农他们当时的兴趣，不是写新小说，发表激进言论，而是抱着一份人文情怀研究古代文学史和民俗，还在旧体诗词、书法这些领域显示出色的造诣和才华。空间的变化造成了文化姿态的变化，时空交叉内化为新的文化心理结构。

由于地域文化的特别缘分，重庆学术界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这给现代重庆文学史研究增加了分量，取得丰硕的成果。应该强调的是，地域文学研究必须有全国眼光、全球视野，才能在总体和分别的